

徐序

一論黃帝涿鹿之戰與我國抗日戰爭之戰略一

中國抗日之戰爭，去今已三十餘年矣！吾人追溯此一戰爭之經過，實由於我民族之自我醒覺與我最高統帥大智大仁大勇武德之最高發揚。惟我民族之能自我醒覺，故能經歷八年長時期之抗戰而不屈服。惟我統帥有高邁之智慧與百折不撓之勇氣，故能以劣勢之衆擊破強敵而獲得勝利。考我國數千年來，自古即有外患之侵陵，黃帝時代有蚩尤之入侵，夏有有苗，商有土方與鬼方，周有玀狁與犬戎，漢有匈奴，晉有五胡，唐有突厥，宋有遼夏金元，明有滿清。然此諸外族之能蹂躪我全中國而能滅亡我民族者，歷史上祇有黃帝時代之蚩尤，宋代之蒙元，明代之滿清，與此次日本之侵華。至其他外族，其力量尙不能與此四者比倫也。就此四次外患而論，宋代明代覆亡後而不能復國，且置勿論。其能及身將敵人擊退，重建我民族國家者，厥惟有黃帝擒殺蚩尤涿鹿之戰與我抗日戰爭獲得勝利之兩次。在此兩次戰爭中，我方都是以劣勢之兵力與散漫之衆當強悍兇暴之敵，經歷千艱百難之奮鬥始獲得勝利。吾人細考此兩次獲得勝利之主要原因，都是由於我民族之自我醒覺，團結一致，與我統帥智慧高邁，超絕羣倫。此兩次之抗禦外敵，時間雖相隔數千年，然有其相同之處甚多，足供吾人之研究，茲就其大者加以比較研究之。

黃帝之事，時代遼遠，史料缺乏，頗難作精詳之敍述，就史書大體言之：當時中國尚係一種原始的民族社會，沒有一個統一之政府。所謂民族社會，乃是以血緣為中心所組成之部落。史書所稱之「萬國」，即是說明此種部落國家之衆多。所謂「諸侯」，即是指衆多氏族國家之首長。其時為神農氏之世，所謂神農氏，乃是其族對於農業之發明有甚大之貢獻，故為中原各氏族推為天下之共主，當時實尚未具有統一國家之型式。至於蚩尤，為居於南方之一種漁獵民族——黎苗族——之首長。昔吳起對魏武侯說：「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①可見黎苗族是散居於今湖南、湖北、及江西、安徽兩省之北部，其繁衍區域甚為廣大。漁獵民族，一般兇悍殘暴。因日以狩獵掠奪為生，故其戰鬥技術與組織較為健全。在古今中外歷史上，蠻族總是較農業民族為兇悍，即以此故。史書載：「在神農氏之世，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②尚書呂刑篇載：「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奪攘矯虔。」^③這就是說，蚩尤率領着八十一個兄弟氏族，斷髮紋身作野獸之裝束，頭上戴着牛角牛皮做的盔冑，手上仗着刀戟大弩殺進了中原。中原最初受害的自然是居住於今河南省南部神農氏諸氏族。神農氏都於陳（今河南淮陽縣），其末主榆罔，對蚩尤族之入侵無力抵抗，倉皇逃往空桑（今山東曲阜縣）。蚩尤既攻入陳都，即自稱神農氏，欲藉以號令諸侯。^④蚩尤之兵乃大肆姦淫殺掠，擄捕人奴。此即尚書呂刑篇所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奪攘矯虔」之實際情形，矯虔乃是超出常情，大出意外之意。我們讀了此一段歷史，就可回想到三十餘年前日軍侵入我中國時，到處姦淫殺掠，焚燒廬舍，在攻陷南京

一地時，就殺戮平民二十餘萬之衆。將此兩段歷史作一對比，就可知野蠻民族之兇狠殘暴，古今一體。此古今歷史可以相互印證者一也。

其時中原各氏族國家之人民，目覩父老兄弟爲蠻族所殺戮，妻女爲蠻族所姦淫，家室爲蠻族所焚燬，子女爲蠻族所擄俘，財物爲蠻族所刦奪，真是屍骸山積，血流成渠，成爲人間至慘之浩劫，祇有自己奮身而起，冒死與敵人鬥爭，纔能獲得一線之生機。於是大家奔集於較北方之少典氏之氏族國家，民族英雄之「黃帝」，即乘時奮起，振臂一呼，來負起捍衛民族存亡之重大責任。其時彼僅爲一位二十餘歲之青年氏族領袖也。⑥黃帝名軒轅，爲少典氏之子。少典氏族，居於今河南省鄭州附近，以熊爲圖騰，故亦稱有熊氏。黃帝之父，爲一方諸侯之領袖，因之爲諸侯所依歸。諸侯既奔集少典氏，乃羣推黃帝爲抗敵之統帥。此即史書上所載「蚩尤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之史實。⑥此種中原民族之自我醒覺，即爲以後黃帝擒殺蚩尤之基本力量。此段歷史，若與我抗日戰爭相對照。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我總統蔣公方退職閒居於家鄉。各方將領以日寇兇橫暴戾，有滅亡我中國之危險，羣請蔣公復職，領導羣倫以救危亡。至「七七」全面抗戰後，大家喊出「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一致奮起，共赴國難」之口號，齊集於國民政府之下以事抗戰。此種民族之自我醒覺，實與黃帝時代之抗禦蚩尤相同。此古今歷史可以相互印證者二也。

其時蚩尤之兵聲勢浩大。彼襲取神農氏之名號以號令諸侯，一面進兵空桑追殺榆罔，一面集兵於空桑附近之山東平原，有向西進攻以

席捲中原之勢。此即史書所載「威振天下」之形勢，實亦中原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也。黃帝鑒於中原之平原散地，無險塞可以自固；自己氏族之兵爲數寡少，不足以獨當強敵；而諸侯之兵來自各地，亦難以指揮如意。於是乘冬季黃河水涸之際，急急將主力軍渡過黃河脫出蚩尤之包圍圈，而留置一部於黃河南岸敵之外翼以牽制敵軍。這樣就逼使蚩尤之軍不得不變更其原定由東向西之進攻，改變爲由南向北。此一改變，遂使蚩尤不得不孤軍深入華北嚴寒之地以與黃帝之兵決戰而敗亡。所以蚩尤之此一改變，實爲當時兩軍勝敗之轉捩點，乃是黃帝高深戰略之所運籌，要非恆常之人所能窺其奧秘，以後一般之史學家認爲蚩尤是生長於南方溫暖之鄉，何以會深入華北嚴寒之地以與黃帝對戰，疑爲史書之捏造。惟有太史公司馬遷獨能領會其意說：「非好學深思，必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⑦其實蚩尤之兵若欲西進，其右翼側背將受黃帝之夾擊，亦不免於失敗。所以蚩尤之改變進攻方向，實爲其不得已之舉。此種黃帝之高深戰略運籌，同樣亦於我抗日戰爭中屢一見之。茲先述其大者：當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初發生時，日軍按其預定計畫，急急派遣四個師團兵力，由我東北九省直撲華北，意欲仿效昔時滿清入關之戰略，由華北進攻華中與華南，我總統蔣公窺破其詭計，乃以主力軍猛攻上海之日軍。上海爲國際關係重大之商埠，世界觀瞻之所繫。日本爲顧全顏面計，不得不由國內派遣兩個師團以增援在滬之日軍。嗣後因我軍之猛烈攻擊，日軍乃陸續由其國內增派三個師團、兩個旅團及戰車兵、砲兵等部隊，分三次增援，但仍不能擊敗國軍，最後乃將在華北作戰之三個精銳師團及國內一個師團轉用於上海地區，因而轉移其作戰重點於長江方面。遂將

其原定由北向南之戰略改爲由東向西之進攻。此一改變，遂使日軍陷入泥淖，八年而不能自拔。所以此一改變，實爲中日兩方面勝敗之轉捩點，亦爲 總統 蔣公最高之戰略運籌，祇有黃帝引誘蚩尤於涿鹿之野之戰略堪與媲美，古今中外歷史上實罕有其匹儕也。此古今歷史可以相互印證者三也。

黃帝爲引誘蚩尤北進至預定之戰場——涿鹿之野，但惟恐中途停留不進，在中原肆行劫掠，乃作猛烈之反攻以牽制之，一面藉以消耗其戰力，一面於消耗敵之目的達成後即向北撤退；並遺留許多物資以利誘之，使其益生驕狂輕敵之心。此種引誘之反攻，次數甚多，但最大之反攻計有三次。史書所載「三戰而後得志」，即是指此三次引誘反攻而言。^⑧蚩尤自經此三戰而三次獲勝以後，自覺所向無敵，自然是志得意滿，再也不把黃帝之兵放在眼中，因之就輕率北進至於涿鹿之野。所謂「涿鹿」，乃是以涿鹿山而著名。其山在今涿鹿縣之南與涿縣之西北，爲太行山之一支，中有涿水，由涿鹿縣經涿鹿山、涿縣城東北流入白馬河而入渤海。所以此一地區在古代都稱爲涿鹿或涿郡。所謂涿鹿之野，即是指涿鹿山以南之平野，亦即今涿縣城四周之平原是也。此地區東有黃河下游之沼澤地無法通行，西有太行山脈之高聳無法迂迴，前有數條河川橫亘其間，自古以來即爲良好之戰場。黃帝選擇此區爲與蚩尤決戰之地，實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利。蓋蚩尤來自南方溫暖之地，不習於華北寒冷之氣候，而黃帝之兵則習之；又黃帝所率領諸侯散漫之兵，至此則無退散之顧慮，祇有一心一意以求戰鬥之勝利，此即得人和之利。黃帝於此，乃以一部兵力散置於正面以阻敵之前進，而以主力伏匿於太行山山地之中，乘敵軍北向作正面進攻

時，繞出敵後而包圍殲滅之，遂以獲得全面之勝利。蓋此時蚩尤之兵，已是轉戰千里，長途跋涉，又受華北地區寒冷氣候之侵襲，饑寒交迫，實已不堪一擊也。以後孫武兵法說：「敵逸能勞之，飽則能饑之，安則能動之。」^⑨黃帝涿鹿之戰，以諸侯散漫之衆而能勝蚩尤之整；以寡弱之衆而能勝蚩尤之強，即為黃帝能創造此種原則所獲得之勝利。所以孫武最後說：「此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⑩我們再回看中國抗日之戰：日本之強，其船堅砲利，飛機成羣，其力勝於蚩尤之衆千倍或萬倍以上，其裝備之充足與補給之便利，固不能用黃帝之法以勞之饑之動之也。我 總統蔣公乃用另一方法，其效用實與此相同。

蔣公努力開闢香港之運輸補給線，開闢海防鎮南關與滇越鐵路之運輸補給線，開闢滇緬路之運輸補給線，開闢喜馬拉雅山「駝峯」之空運補給線。此在外形上，祇是為運輸物資而設防，所以能得各鄰國之諒解與同情。然在戰略運籌上，乃是迫使日本不得不分其兵力以進攻香港、越南、馬來、新加坡、緬甸、印度、菲律賓、印尼，以及進攻美國之珍珠港、關島與中途島，促使諸國與我國結為同盟。以愛好和平之人民與軍備陳舊之中國，當新興軍國主義之日本，其初期形勢無異以卵敵石，而卒能引起世界各國羣以日本為敵，與我為友。此在軍事戰略上，為「合則能分之」原則之應用，而在國家戰略上，則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威畔之。」之最高運用。此種國際形勢之轉變，而我方都是以尋求運輸物資之方式出之，其戰略運籌之高超為何如耶！所以到了湘西邵陽之戰時，日本國力已是分散於太平洋與亞洲東部之全域而消耗殆盡，其軍隊已成為強弩之末，不堪一擊了。終於使日本無條件投降接受軍法審

判而結束戰爭，皆是此種高邁之戰略運籌有以致之。此古今歷史可以相互印證者四也。

黃帝於涿鹿戰勝蚩尤以後，對於中原民族存亡之威脅解除。於是除誅殺首惡蚩尤等少數人外，對於黎族之一般人民，視同自己之子民，一律與以收容與教化，即成為以後尚書所載之「黎民」（指散居在各地之黎民）與「黎國」（黎國為黎族所建之國在今山西省黎城縣）。此項黎族人民，至堯舜時代已與中原人民同化，無有畛域之分。尚書堯典篇所載「黎民於變時雍」，即是說黎族人民都已變化其兇悍暴戾之氣質，而與中原人民和雍共處了。黃帝當時用兵之目的，祇是為保衛民族生存而奮鬥。而其最後目的，則在萬國和平以相處。所以他於涿鹿戰後為諸侯擁戴為天子之時，即以「撫萬民，度四方，和萬國」^⑪，為其施政之目標。此即為中國「天下一家」思想之所本。以後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闡繹弘揚，成為中國傳統思想之洪流。吾人追溯其本源，實由黃帝創導之機先也。至於我抗日之戰爭，我總統 蔣公對於日本投降後之處置，除責令其歸還其所強佔之台灣澎湖外，其餘罪行未加深究，並保持其國體，遣返其戰俘，未索其賠償，所謂「以德報怨」，乃盡人皆知之事。此為我 總統 蔣公宅心仁厚寬大博愛之所施為，其為直承自黃帝以來中國之傳統思想而無疑。此古今歷史可以相互印證者五也。

總以上之研究，可知我國歷代之外患，都是由於人民心理之散漫，經濟之在弱，軍備之陳舊，因而引起侵略者之貪慾。假使人民心理奮發，政治經濟發皇，軍備足以自衛，則侵略者自不敢貿然作侵略之進攻。以上所述兩次之敵人侵入，雖喚起全國人民之自我醒覺，但敵

人殺戮我人民數十萬乃至數百萬人，財產之被掠奪與毀損不可以數計，可見此種醒覺所犧牲之代價，實在過於高昂。若將此種代價在早期付於人民之教育，政治經濟之發展與軍備之加強，則可不必受此種重大之犧牲。所以消弭戰爭，在於自強。

其次再說軍備，前述兩次我國對外敵之戰勝，全是賴於統帥之智慧與其戰略運籌之高邁。假若我國軍備與敵人大略相等，加上統帥智慧之運用，則可不必持之八年之久纔能結束戰爭。所以一個國家必須有適度之自衛武力，縱使不能優於敵人，亦必須與其略等，庶可免去此種長期戰爭之犧牲。所以加強軍備，尤爲首要之舉。

再次說到統帥之智慧與才略。我國四千餘年來在數十百次外敵入侵之戰爭中，能及身擊敗敵人而重建國家者竟如此之少，可見統帥才略之難求。不過此乃由於我國歷來崇尚文治，不尚武略之所致。然此祇能適合於閉關自守之時代，而不適合於列強相處開放之時代。總統蔣公特別提創文武合一之教育，就是使文人熟習世界軍事之趨勢，軍人能深知世界政治之情況，斯能文武相輔，躋國家於富強。此種真知灼見，可爲我今後立國之方針。至本文所述之各種戰略運籌，乃是統帥智慧之產品而非智慧之本身。孫武兵法說：「戰勝不復。」又說：「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⑫這即是說用於一次戰勝之方法，用於第二次未必能以再度獲勝。必定要因敵情之變化而隨時想出制勝之方法，纔是神明之智慧。所以本文所敍述之各種戰略運籌，祇可作爲智慧之啓示，不可視爲戰爭必勝之方法。

前哲往矣，吾人緬懷其德澤，敬仰無已。世變方膺，時局蹇屯。過去之侵略者固已服其罪罟；而現在之侵略者，方張其兇惡之爪牙以

噬人。吾人祇有臥薪嘗膽，朝夕惕勵以捍衛民族之生存。庶幾可以殷憂啓聖，多難興邦，則今日對於過去史事之檢討研究為不虛矣。

余友蔣緯國上將，夙研韜略，近其精心撰寫之中國抗日禦侮史初成。余受而讀之，覺其對抗日戰爭之全程敘事精詳，論評正確，堪稱不朽之史乘。尤其對總統蔣公在全戰爭中之戰略運籌與其偉大之仁德施為，足為吾人所拳拳服膺與終身研習。時余正撰寫中國建國軍事史古代篇，發現黃帝之建國過程，與我國抗日戰爭在戰略運籌方面有其相同之處，因此作一比較研究寫成此篇，用代作序，亦以介紹將軍之作於大眾焉。

徐培根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十日於台北。

註釋

- ① 見史記卷六十五孫子吳起列傳。載吳起對魏武侯（姓魏名摯，為魏國君子）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
- ② 見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蚩尤條正義引龍魚河圖云：「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造五兵、仗刀戟火弩，威振天下。」
- ③ 見尚書呂刑篇。
- ④ 見逸周書史記篇註。
- ⑤ 見竹書紀年義證卷一黃帝款「二十年景雲見以雲紀官。雷學祺案此紀黃帝滅蚩尤，諸侯擁戴乃即帝位。景雲見者，帝受命之符應也。」因之可推算黃帝於十九年擒殺蚩尤，時黃帝為三十歲。
- ⑥ 見史記卷一五帝本紀黃帝節。
- ⑦ 見尚書五帝本紀贊。

- ⑧ 見同上書黃帝節。
- ⑨ 見孫武兵法虛實篇。
- ⑩ 見同上書行軍篇。
- ⑪ 見史記卷一五帝本紀黃帝節。
- ⑫ 見孫武兵法虛實篇。